

婺源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婺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WUYUAN WENSHI ZILIAO

44160/08

婺源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贈閱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图

书

★ 办公室 ★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婺源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认真贯彻全国文史 工作会议精神,努力开创我县 文史工作新局面

崔 振 华

《婺源文史资料》第一辑出刊了。

这个不定期内部资料的编辑宗旨是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广泛征集我县近代和现代各个历史阶段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资料，尤其着重编写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史，从而丰富政协文史资料宝库。

我们县是一个有着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县。历来文风鼎盛，人才辈出。据《县志》记载：自宋至清，有文人504位，仕宦2665人，著作1275部，其中选入四库全书的有157部。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学、科学家、诗人、画家、篆刻家、书法家、中医、工程师犹如群星灿烂。有的是一代宗师，有的是群伦表率，有的以文章激动今古，有的以事迹饮誉中外。代表人物有朱弁、胡仲、汪藻、朱熹、胡炳文、何震、詹希原、江永、汪绂、齐彦槐、詹天佑等。在近代和当代、婺源籍的教授、专家、学者更是数以一二百计。因此，婺源有“书乡”之称。

婺源还是“物华天宝”的地方。绿茶、荷包红鲤鱼和龙尾现在国外均享有盛名，被称为“三彩”，加上江湾雪梨，又称

为“红绿黑白”四色。林木之茂、矿藏之多，也早已见之报刊。正因为婺源物产丰富，绿茶又是县的经济命脉，一时间，商贾蜂起，远至粤广，近至沪杭，茶号货栈，可谓星罗棋布。据有关资料叙述，婺源籍商人，不少居于首富之列。民国年间的上海，被称为“茶叶大王”的郑鉴源，“纸张大王”的詹沛霖，“照相器材大王”的詹砺吾，其影响所及，仅亚于“面粉大王”“棉纱大王”的荣氏家族。

婺源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，万山起伏，千峰逶迤。旧社会，由于广大农民所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便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。皖浙赣省委领导人关英、刘毓标、李步新、江天辉等革命先辈在鄣公山建立了根据地，率领人民群众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。解放战争开始，新四军有熊兆仁、余华（余纪一）、倪南山领导的皖浙赣支队挺进婺源，粉碎了敌人六次“围剿”，解放了除县城附近村镇以外的六分之五的土地。解放大军渡江前夕，皖浙赣支队乘胜进军德兴、玉山、上饶等县的一些乡村。除军事上取得辉煌战果以外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发挥了巨大威力。婺源县境的上层人物和地方士绅，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，逐渐由反对、怀疑而认清大局，他们纷纷向我党靠拢，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。

还有1934年至1946年之间发生的所谓“回皖运动”，情况错综复杂，也很值得收集和撰写。

上述只是数例，由一斑而窥全豹，足见我县有关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资料是相当丰富的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繁重而紧迫。政协委员是文史工作的主要对象，又是文史工作的依靠力量，他们遍及社会各阶

层，通过他们可以把社会联系起来。因此，我们要广泛地和他们特别是他们中那些阅历丰富的同志交朋友，采取因人定题或按题找人的办法，请他们撰写“三亲”（亲闻、亲见、亲身经历）回忆录，这就不但调动了他们本人写稿的积极性，还可通过他们去团结更多的各界人士都为文史工作出力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广开渠道，争取各方面力量支援文史工作。

文史资料工作，是周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，是一项惠及后世子孙的重要工作。当前，随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的深入贯彻，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广泛，台湾回归祖国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已经取得新的进展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正在全国深入开展。在这种新形势下，文史工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更显得重要，意义更显得深远。

最后，我希望《婺源文史资料》一期一期编下去，一期比一期编得更好，为开创我县文史工作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目 录

认真贯彻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

努力开创我县文史工作新局面·····	崔振华 (1)
婺源·····	胡绩伟 (1)
武装斗争与统战工作相结合·····	余纪一 (2)
“婺绿”经济史略·····	刘隆祥 詹成业 (12)
赞茗眉·奇峰·····	王钟音 (38)
龙尾砚小史·····	王洞石 (39)
詹天佑史料拾遗·····	王季桂 (56)
婺源简介·····	齐启林 (70)
政协婺源县委员会历届情况简介·····	欧阳虹 (74)

婺 源 *

郭公岭下婺江源，
赫赫苍眉碧山川。
龙尾红鱼书香县，
阳关快马再加鞭。

文公阙里出书生，
处处苦读又勤耕。
红色鲤鱼游华夏，
龙尾雅砚誉东瀛。

*本诗系《人民日报》社社长、中共中央委员 胡绩伟同志于1982年7月来婺，“八·一”节时所题。此诗收入本辑时，未征求本人意见。

武装斗争与统战工作相结合

余纪一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们在以婺源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斗争中，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华中分局、华东局的有关指示，开展了统战工作。现就这方面谈点亲身经历。

一

我于1931年至1939年，先后两次到皖南参加革命活动，主要在徽州从事党的组织工作。1939年6月，因国民党当局对我审查，要我参加国民党，并限定15日前答复，于是，我14日离开屯溪，到新四军军部工作。解放战争开始，我在华中分局。1946年7月初，领导上派我去皖南传达华中分局7月1日给苏南皖南党组织的指示。“七一”指示包括解放区工作、敌后游击区工作和城市工作三个方面的内容，要求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，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，粉碎蒋介石的进攻。我到了青阳，住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次权家，他的侄于陈法周是共产党员。我找到杨明同志，传达了“七一”指示。住了两天，回到上海。为了配合敌后武

注：余纪一，即余华，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

装斗争，我先后把范治农、陈默若、余起、汪怀仁等同志找到一起，研究安排他们打入国民党，主要在蒋管区皖南开展民主运动。我们还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建业公司，由戴戟任董事长，有交通车至屯溪，为游击区建立交通线。后来又在屯溪设了分公司。我还联系了几位同情我党的人士，通过上层关系，派他们到国民党机关工作。如派操竹友去宁国当县长，程中一经过我们同意到贵池当专员。当时担任国民党婺源县长的周雨农也与范治农有过联系。我们还联络了原皖南总动会副主任金慰农，黟县大士绅程梦余，他俩在大革命时期是靠拢我党的。还发展了景德镇钱庄的舒黎望（他的女儿舒素玉在屯溪隆阜女中读书时是共产党员）为我们的联系点或交通员。这是为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做的准备。

后来这些地方的同志，在皖浙赣边区的游击战争中，起到了很好作用。上海给我们派了医生方心白，在根据地建立了医院，还通过屯溪给我们输送药品、收音机等。我们有的病员能经过各地交通站到上海治疗。景德镇的舒黎望动员了两名医生，购置了药品、棉布等来我根据地。我们还通过胡钟英，经常秘密地经过祁门绕道到鄣公山，为我们输送物资。同时，各地的同志为我们及时递送情报、判明敌情、交通联络与上级取得联系，做地方士绅和敌方军政人员的团结争取工作，都获得较好的效果，有力地配合了游击战争。

我在皖南找到了胡明、杨明等同志，传达了“七一”指示，经过一段工作，了解了当地情况后，于1947年9月回到山东，向张鼎丞同志作了汇报。领导上要我到皖南游击区工作。我于10月又到上海，确定范治农、王宇同志仍留在上海，范抓统一战线，王做党的工作，派张振英同志到屯溪、

陈默若同志到南昌做秘密工作。我同余起同志经芜湖到宁国操竹友处，通过我们在各地的关系，安全地到达了皖南地委的驻地，找到了胡明同志。在我来之前，地委收到了华东局3月8日的指示，要他们在发展游击战争到创建根据地时，总的方面应以赣东北为主，到赣之浮梁、婺源等县，创建第二中心根据地，并与福建武夷山的游击队打通联系。为了贯彻执行华东局的指示，地委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地区前进委员会，担负向南进军的任务。前委会由熊兆仁同志任书记，我任第一副书记，罗白桦任第二副书记，杨明、倪南山为委员。

统战工作，在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作了部署，提出了“努力迅速开展城市工作，建立战略情报，开展爱国统一战线，配合农村游击战争”的任务。进军前还制订了《新四军皖浙赣支队告民众书》（当时仍用新四军名义），申明对待工商业、地方武装、国民党官员、乡保甲长、土豪劣绅、特务等政策，随着进军时散发宣传。进军后，1948年7月中旬，前委在中心区黄村召开扩大会议，学习毛泽东同志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》，总结进军四个多月的工作时，又明确地作出了“武装反清剿与统战工作相结合”的部署。因此说，我们从1947年10月前委成立，至1949年5月皖浙赣边区解放的整个革命活动中，始终贯彻了以武装斗争推动统战工作，又以统战工作配合武装斗争这一方针，从面团结、争取、利用了一切爱国力量，孤立、瓦解、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，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。

我们刚进军婺源时，敌人不让我立足，在军事上对我军进行堵击、追击和合击，政治上散布谣言，强迫群众放哨、探信，镇压与我接近的群众。因此，中上层人士对我们怀疑、恐惧，基本群众不敢靠拢我们。开始我们所到之处，有的村子群众几乎逃光。我们在军事上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，在政治上开展广泛宣传，以提高我军的威力，扩大政治影响，同时努力争取与保甲人员见面，稳定上中层分子，提高基本群众革命信心，使之不逃避我们。当我们跨进边区，在休宁的上大连，就遇敌人的堵击。打退敌人以后，到老根据地休宁查山放下伤员，又继续南进。到休婺交界的樟前，我们争取了开小店的保长，为我部办事。这里地处边沿山区，离屯溪较近，后来递送情报、邮寄信件，都通过他到屯溪寄出。

到达婺源鄣公山立足后，我们的方针和策略就是团结进步力量，争取中间势力，打击最反动分子。变“一面派”为“两面派”，建立“两面派”政权，进而充分发动群众，发展革命武装，成立民主政权，建设根据地。我们努力争取与各阶层见面，首先是突破保甲人员和地方士绅，只要他们以后不反共，就既往不咎，一律加以保护，同时教育他们如何应付敌人的反共政令，使一些人由初期对我害怕躲避，帮助敌人探信放哨，转变到靠拢我们，为我探信，进行“两面放哨”（为敌人放哨，给我通报）。而这种争取工作又是以政策教育和开展斗争相结合进行的。5月初，我们武工队到菖蒲山开展反

霸斗争。开始，恶霸保长吴文志进行破坏，利用其兄弟拉拢甲长、士绅为其说话，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。武工队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，找到了红军留下的种子、受其迫害的吴启耀，串连发动了基本群众，开展了反霸斗争。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吴文志的罪恶，将其枪决。对参与他活动的人，我们进行教育，不咎既往，还散发了宣传单，申明枪决吴文志不是因为他当保长的职务，而是由于他罪所应得。莒莒山的反霸斗争，发动和组织了基本群众，吴启耀和一名积极分子自动参加了我部。成立了“反蒋保家队”和“反蒋保家会”，争取了包括甲长和乡民代表在内的可以争取的力量。这场斗争影响很大，对后来争取保甲长和士绅产生了极好的效果。我们主力部队在敌区打下豸下、中云两地乡公所后，强调保护商业，不使商人的利益受到侵犯。结果中云商绅送布赠款慰劳，30里外的清华镇商绅闻讯也派人前来与我接洽，望日后给予照顾。

争取工作往往又要经过反复斗争才能巩固。有的地方势力，所以接受我们的争取和利用，其实质是为了求得保身、保家、保权。在敌人薄弱的时候，表现为靠拢我们，为我办事；一到大批敌军前来清剿时，便两面送情，避免敌我在当地战斗；还有个别反动分子，甚至为敌人送情报、带路、攻打我们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了这一点，强调既不能“左”，也不能右，不要给一些人的假象迷惑，要预防他们的动摇甚至反动的一面，开展积极的斗争。5月中旬，皖七专保安副司令孙立均调集了皖浙赣三省地方武装七个中队，对我们进行第二次“清剿”。菊径的士绅向浮梁来的敌人送钱请酒，并派保队坵王华之为敌带路，企图杀害我武工队和地方干部，因

走错路其阴谋未被得逞，在莒葛山抢劫了群众的财产。反“清剿”胜利后，我们组织群众武装，逮捕了王华之，召开斗争大会，予以镇压。对从犯宽大处理，责令其当众悔过，罚其赔偿群众的损失。我们还抓住这件事，组织地方士绅和乡保人员讨论“如何才能使地方安全”，以村为单位制订了“爱国反蒋公约”。这样，不仅摧垮了顽固势力的反攻，而且教育了地方人士，控制了“两面派”，一些逃避在外的人消除了顾虑，自动归来。

三

统一战线，只有依靠武装斗争才能实现，但又给武装斗争以有力的配合。1948年4月8日，我们到达鄣公山，15日得悉甲路、赋春两地敌情，便乘虚奔袭，先后攻下了两地乡公所。在赋春俘县府秘书、县捐税稽征处长、乡长等官兵十余人。我们对被俘人员不仅未予惩办，而且请吃款待，进行教育，晓以大义，然后释放。鉴于当时婺源县县长周雨农曾与我们有过联系，我找了县府秘书个别谈话，并写了一封信，要他交给周雨农。信的大意是要周以后不要妨碍我们的行动，如果上级有命令，也要做假汇报。结果起了很好的作用。不久我支队一部赴浮梁洞里，途中与周雨农率三个中队相遇，他们占据有利地形，如果要打，我们要吃亏。周对官兵说，这是真正的新四军，是打不掉的。一枪未发，调头走了。周雨农在任期间，对上级的反共政令是消极应付的，后来汤恩伯当衢州绥靖公署主任，把他撤换了。

1948年6月，敌人发动第三次“清剿”。婺源当局，在军

事、政治、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，皖省府再度派孙立均出马，率十个中队的兵力向我进攻。中旬，敌军陆续入境，对我展开包围。当孙立均率部从清华出发，向我根据地白山的附近车田村进发时，熊兆仁同志和我率部从白山撤出，黑夜绕道到离清华一里多路的一位士绅家里，打听到敌指挥部设在清华，我们决定吃了饭奔袭清华。这位士绅还为我们带路，抓住了敌哨兵，叫开了区公所的门，俘虏了县治安委员会委员、联防区主任、乡长和孙部留守部队二十多人。连夜我们召开了被俘人员座谈会，详细讲明我党的主张和政策，然后释放（敌留守士兵带走，约二十多天，教育后释放）。此举使清华的各界人士深受感动，他们纷纷慰劳我军，有的还献出枪支弹药支援我们。这一着，引起了连锁的反应，对反“清剿”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孙在根据地扑空，又得知留守处被袭，急忙回到清华，把满腹恼火倾注在被我俘释的人员身上，说他们“通匪”，予以扣押，吊打乡长，勒款三十多万元。当时清华的士绅们很愤慨，都说“不怕新，只怕孙。”被我释放的县治安委员会委员黄琴父致函县长亦叹：“人民对新四军的拥护，是我们最大的失败。”这就造成了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，双方打官司，闹到专署和省府。孙立均诉述婺源当局有人充当“内奸”，开门“纳匪”，对清剿部队的给养输送拖延等等，而婺源当局控告孙立均“剿匪”不力，放纵部属淫掳抢杀，甚至祸及士绅等等。不久孙立均奉令调回屯溪，“清剿”便草草收场。这件事还闹了很久，直至迫使孙立均告假下台。

我们在开展游击战争，打击反动势力，摧毁反动政权的过程中，结交了一批各阶层人士。其中有国民党县政权的主

要人物，取得他们的帮助，使我们在敌人的控制区内，少数人都可以去联络，开展活动。如6月中旬，在第三次反“清剿”时，我们攻下虹关乡公所，俘释了黄埔军校毕业的原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詹琪，争取了他为我部办事。以后我们在东北乡一带活动就方便了。詹与上海有亲戚交往，曾给我们购买药品等物，我部鲁枫同志在上海治病，也是由他护送回来的。我们到乡下活动，结识了当地士绅潘麟，他的儿子潘启琦曾在新四军五支队工作，与我同事。潘麟颇有威望，他为我们办了不少事，使我们在那一带能顺利地开展工作。攻打中云敌据点时，争取了当地大地主王兰波，他帮助我们策动了县自卫常备中队长齐昌起义。1949年1月间，齐昌奉命带一个中队到甲路建碉堡、设据点，企图卡我西南乡的要道。我们通过王兰波把齐昌叫到中云，工委几位领导，亲自劝其弃暗投明。齐昌同意后，连夜带我们去甲路，先拿下一个碉堡，另一个碉堡不听齐昌的话，我们便强攻，迫使敌人全部投降，收编为我部一个连，让齐昌任连长。

在人民解放军大部队渡江时，我们抓住敌人军心动摇，士气陡落这个有利时机，大力开展了政治攻势。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和各方面人士的活动，促使了不少敌人武装向我起义投诚，顺利地解放了边区的重镇和县城。皖南重镇屯溪，当时驻有一个师的兵力，都是美式装备，由安徽省保安司令部警备处长、屯溪留守处主任方师岳指挥。我部派张振英同志和支队医院院长方心白（方师岳的远房本家），通过省参议长江彤候的联络，迫使方师岳率部投诚，和平解放了屯溪。

四

我们在武装斗争中开展统战工作，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效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：

（一）全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，我军前线战场的节节胜利，加上根据地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“清剿”，使革命力量不断增强壮大。敌人军心涣散，各阶层人士思想动摇，想留后路，这就给我们开展统战工作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
（二）华中分局和华东局的有关指示，使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策略。开始，我们在《目前形势的特点与我们的策略方针》中，提出了“对特务反动派以烧对烧，以抢对抢”的策略，上级及时地对此作了纠正，帮助我们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认识。我们在斗争中紧紧把握住“发展进步势力，争取中间势力，孤立、分化敌人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。朋友愈多愈好，敌人愈少愈好”这个总方针，积极地、广泛地、大量地做好各种人的教育争取工作。在婺源中心区，我们只镇压了坚持与我为敌的一个保长、一个保队附和顽抗到底的县自卫常备大队长黄湛清，而又是在有利于发动群众，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进行的。这就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爱国反蒋大军，使敌人极端孤立，以致失败。

（三）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干部队伍，特别是工委的领导同志与敌人作过长期的斗争，能够正确地掌握和贯彻党的方针、政策和策略，讲究斗争艺术。我们确定凡是统战工作的问题，必须经工委几位领导同志商量，并亲自进行工作。开

始有的地方出现过右的偏差，争取工作被假象迷惑，导致敌人前来进攻，使我们无法立足；也发生过没收保甲长财产的“左”的偏向。但是，一经发现，就及时纠正，使统战工作能够顺利开展。

(汪中汉整理，经本人审定)